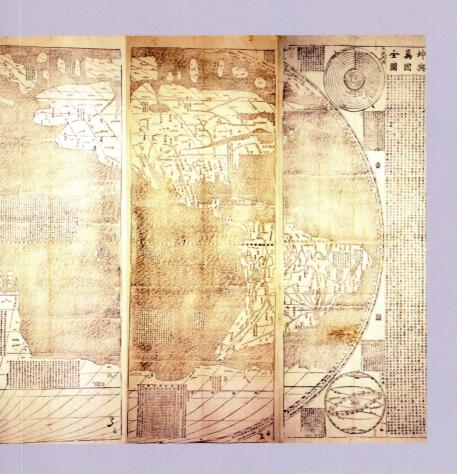
旧学新知 ——中欧知识与技术之演变





法国汉学 第十八辑

旧学新知

——中欧知识与技术之演变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陆 康 张柏春 主编

SINOLOGIE FRANÇAISE XVIII

Ars, Cognitio et Scientia L'évolution des savoirs et des techniques en Europe et en Chine à l'époqu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Luca GABBIANI, ZHANG Baichun

Zhonghua shuju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ékin 2018

展示自然

——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1874—1952)

戴丽娟(Li-Chuan TAI)* 著

在针对科学技术等新知的生产、传播与制度化的历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奠基型人物、学派、大学学院、研究机构,乃至于学会、实验室、期刊、教科书等组织和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而对于博物馆(尤其是自然史博物馆)曾经发挥的作用,专门研究却显得单薄许多。事实上,若要了解十九世纪欧洲科学的发展,对于"博物馆式科学"(museological sciences)这种知识类型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①。例如,若不提法国自然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或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博物馆之收藏与研究,我们几乎无法理解鸟类学这个专科是如何建立的②。在中国,"博物馆式科学"也曾经出现在与西洋文化接触较多的租界中。若能对此加以深入考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自然史研究的初期发展③,尤其是生物学等学科尚未在大学建立时的状况。有鉴于此,

^{*}戴丽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见 John V. Pickstone, "Museological Science? The Place of the Analytical/Comparative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History of Science*, 32 (1994), pp. 111-138,及同作者专 书 Ways of Knowing: 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尤其是第三章。

②Paul Lawrence Farber, Discovering Birds: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1760–185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此处的自然史研究一词所对应的即是英文中的 natural history。有关此词的中文翻译,有人主张应以博物学或博物志译之,较符合中文语境中的理解。此主张或有道理,但是若考虑到 natural history 与其源头之一 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或其结果之一 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史博物馆)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律以自然史一词译之,因为"博物神学""博物学博物馆"在中文语境里均未被普遍使用。

本文即以 1874 年设立于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院为对象,分析其发展过程、标本制作技术和展示方法的引进,以及其欲传达的动物知识与生态意识。

一、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缘起

由于亚洲文会博物院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附属机构,我们在分析该博物院之前,有必要对文会本身有些基本的了解①。目前有关该学会的历史资料,最早可回溯至 1857 年9月24日的创会会议记录②。当天有十八名英美人士出席会议,他们在英租界内俗称洋文书院的 Shanghai Library 召开创会的筹备会议③,于会中通过六项决议,初步决定学会的名称、宗旨和组织架构④,并推举在场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牧师为第一任会长。会中有出席者提出未来可申请加入位于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并成为其中国支会的建议。此议获

①学界目前对于该学会的研究并不多,其中以王毅在2005年出版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一书较为完整。不过此书是以学会会报的文章与当时汉学发展的关系为分析重心,所以对于该机构附设的博物院着墨不多,相关描述集中在书中第三章第二节。也许由于分析重点不在博物院,作者对其数据未做详细查对,因此书中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时有讹误,因篇幅关系,于此不一一指出。

②"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Shanghai Library, September 24th, 1857", The North-China Herald, 26 Sept. 1857, p. 35.

③此小型图书室成立于 1849 年,为英租界最早成立的图书馆之一,后来成为工部局图书馆的一部分。有关其背景简介,见:"The Librar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 Apr. 1874。

④出席者十八人有 Frederick W. Nicolson,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Edward W. Syle, Joseph Edkins, Robert Nelson, William Aitchison, T. Davies, William Lockhart, Frank C. Sibbald, Dr. Nelson, Thomas Moncreiff, Charles Spencer Compton, W. G. Howell, William Keswick, F. D. Williams, Thomas Hanbury, Franks, Robert Reid。根据学会五十周年庆祝会的回顾,这十八人中,担任该次会议主席的 Frederick W. Nicolson 是英国海军校级军官,七人是传教士(其中包括一位医疗传教士,即 William Lockhart),两位是医师,其余八位则是商界人士。见"A Shanghai Jubile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 Oct. 1907。

得与会者的支持,后来也得到其他会员的赞同①。

1857年10月16日,该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确认学会名称为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会员年费为五两银元。不久之后,几位当时在中国的知名英美人士也陆续加入此会,例如墨海书馆主任、《六合丛谈》主编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11月17日的第三次聚会时正式加入,中国海关负责人赫德(Robert Hart)于1858年2月16日加入,原居于广州的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则在1858年4月20日加入②。学会在1858年7月20日的会议中确认皇家亚洲学会已同意将上海这个学会纳为其在中国的支会,因此,在同年9月21日举行的第一届年度大会中,与会者决议从那时起将学会名称改为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但又因此名与早一步(1847年)在香港成立的支会同名,后遂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时人简称亚洲文会或文会)③。从积极加入一个在欧洲有传统的学会这个举动来看,可推断当时学会成员应怀有长期经营、扩大国际交流网络的想法。

若从这个学会初期的组成来看,英、美新教传教士是主要的会务推动者和执行者:除了有裨治文担任第一任会长外,还有艾约瑟(Joseph Edkins)为第一任秘书(1857.9—1858.9),伟烈亚力为第二任秘书(1858.9—1859.9)④,帅利(Edward W. Syle)为第三任秘书(1859.9—1860.9)。在传教士之外,会员来源则多为驻沪军事与外交人员、外商行号负责人或职员,以及中国海关关员。

事实上,从裨治文作为首任会长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学会继承了 来华新教传教士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各种了解中国事务、传播西学的精

①据该会五十周年庆祝会上的回顾,此议是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杨格非(Griffith John)、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合信(Benjamin Hobson)、麦华陀(Walter Medhurst)等人的大力鼓吹下促成的。见"A Shanghai Jubile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 Oct. 1907。

²⁰ld Mortality (pseud.),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30 Oct. 1873.

③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393 页。

④当时其头衔为通讯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不在上海,见 The North-China Herald, 25 Sept. 1858。

神,并且企图将其加以发扬光大。裨治文是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通称美部会)的传教士, 也是第一位 来华的美籍传教士(1830年初抵达广州)①。他来华的渊源与新教第一位入华 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密切相关。由于马礼逊于 1827 年底写信邀 请美部会对中国之传教事业共襄盛举②,裨治文遂被派来协助马礼逊的传教工 作。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创立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且在他于1847年6月移居上海前, 一直担任该刊主编,后来也持续为该刊撰稿。该刊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 时事、历史、地理、风俗文化,被视为是为英语世界建立汉学知识的先驱者之 一③。1902年, 艾约瑟在文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中回忆道④: "透过邀请 裨治文先生担任我们的主席,我们把在上海的文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与其在广州 二十八年的传教牛涯和在《中国从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联系在一起。"⑤由 此来看,文会确实是被赋予上承马礼逊、下启十九世纪后期英美汉学家的中继 角色。文会中多位会员后来确实都成为英美学院中首位汉学教席。以英国为 例,牛津大学首任汉学讲座理雅各布(James Legge,1876年赴任)、剑桥大学首 任汉学讲座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88 年赴任)皆为文会会员。以美国

①有关裨治文,见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 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裨治文原在广州传教,1847 年 6 月移居上海;后来 他为美部会在该地建立第一个传教站。见该书第 262 页。

②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123 页。

③尹文涓:《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2期。

④艾约瑟是文会成立后第一任秘书,1902年时正好担任副会长。

⑤原文如下: "By asking Dr. Bridgman to be our President—a man whose memory went back to 1829, when he was welcomed to Canton by Dr. 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English missionary to set foot in China-we linked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work to be done in Shanghai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ew Society with the work that had been already accomplished in Canton during the twenty-eight years of Dr. Bridgman's missionary life and during the period represented by the Repository. Thus we joined the past with the future. "见"Proceeding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NCBRAS), XXX, 1903—1904, p. ii。该次的会刊即刊登1902年10月16日之会议记录;由于适逢文会45周年纪念会,亦特别刊登艾约瑟和高第两位早期会员的回忆文字。

为例,卫三畏于 1878 年受聘于耶鲁大学,成为美国第一个汉学讲座教授。长期在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的傅兰雅(John Fryer)于 1896 年成为加州大学首任中国语言与文化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在 1901—1902 年初设同类讲座,所聘请的第一位讲座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也是文会会员。而二战后在哈佛大学一手开启近代中国研究的费正清在战前所倾心追随的前辈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更是文会在二十世纪初的主力会员之一①。

学会初期运行顺利,但好景不长,1860年,好几位骨干会员陆续因事离开上海:艾约瑟因应教会要扩大传教范围的需求,在1860年先迁到芝罘,之后又前往天津、北京,一直到1890年前后才又回到上海定居②;伟烈亚力则是在1860年11月初乘船离沪,一直到1863年11月才返回中国③;帅利在遭逢丧妻之痛后,于1860年12月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定居④。在此之后,该会灵魂人物裨治文牧师也在1861年11月2日突然病逝。这些变动使得这个立意良好的组织在1861年底,即运行了四年多后戛然而止,直到1864年初才在伟烈亚力、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于同年3月1日的一次聚会中死而复生⑤。文会自此以后在上海稳定发展,主干会员也从原本的传教士社群逐渐扩大到租界行政人员、外交人员和各商号人士⑥。根据费正清的分

① John Fairbank et al.,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②关于艾约瑟在华传教及其多方面的活动,见 Rev. E. Box, "In Memoriam: Rev. Joseph Edki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 June, 1905。

③关于他离华日期,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第221页。关于他再返回中国的日期,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第222页。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1st ed. 1867),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p. 187.

⑤见 JNCBRAS, ns., 1(1864), p. 175。于仁济医院行医的医疗传教士韩雅各(James Henderson, 1829—1865)为该次会议主席;会议决定召集老会员在3月9日聚会,并邀新会员加入;后来曾任英国领事的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s)被推举为新任会长,汉壁礼(Thomas Hanbury)被选为通讯秘书。

⑥五十周年庆祝会上的回顾文章中点出此变化,见"A Shanghai Jubile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 Oct. 1907。

析,1892年,文会固定成员约250位,其中海关关员占四分之一强^①。在1941年 因战争而被迫中断活动时,文会已有800多名会员^②。

关于学会成立的宗旨,第一任会长裨治文牧师在 1857 年成立大会的开幕致辞(inaugural address)中即点出研究中华帝国的重要性,希望从文学与科学两个大的领域着手进行,正如学会最初的名称所凸显的。但是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外国人该如何入手呢? 他首先指出,西人应该认识学习汉语的重要性,而且应该集合众人的力量,早日达到此目标。其次要做的就是汇集研究材料,包括收集有参考价值的相关系列图书,不论是汉语或外语,所以要成立一个图书室,以便保存与整理这些藏书。另外,对于中国的自然与科学产物,要有一个汇聚所(repository)可以存放,并且要妥善加以整理,以标签说明,而这也就是博物陈列室的功能。最后,他还认为会员、会友的研究成果应实时公诸于世,以促进相关知识的累积与流通,因此应该要出版一份定期刊物③。这些想法在复会后也被明确地载于学会章程内,章程内即说明该会宗旨有三:(一)调查中国与其邻近国家之各项事物;(二)发行会报;(三)设立图书馆及博物馆。若与传教士之前曾经办过报纸、刊物、印刷书籍等活动比较来看,设立图书馆与博物馆似乎是更进一步的新举措,不仅有助于学会成员的切磋研究,也可以扩展文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

二、亚洲文会博物院的成立

该学会运行初期由于缺乏固定会址,因此暂借租界其他机构的场地举办演讲、会议等活动。后在英国政府有条件的永久租借下,学会终于克服取地、筹资建造等困难,于 1871 年秋建成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为会所,从此有了永久栖身之处。会所二楼设有两个大房间,分别作为图书馆和博物馆之用。图书馆当时很快地开始运行,博物馆却延迟至 1874 年 3 月 25 日才正式成立。博物馆成立

①John Fairbank et al., H. B. Morse, p. 94.

②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

③Elijah Coleman Bridgman, "Inaugural Address", JNCBRAS, 1858, pp. 1-16.

后的西文名称为"Shanghai Museum (R. A. S.)",中文名称直译为"上海博物院",但也有许多人习惯地称之为"亚洲文会博物院"。虽然号称为博物院,但实际上这个博物院最初可用的空间不过是会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图书馆因藏书过多而另迁他处,博物院才得以扩大为两个陈列室。会所地址原来在公共租界上圆明园路,有了博物院后,租界市政当局在1886年将该路名改为博物院路(即今虎丘路),由此可见市政当局对该院之重视①。

根据首任名誉院长(Honorary Curator)②普瑞尔(William Burgess Pryer)的年度报告,博物院先前迟未成立的原因有二:其一,欠缺适宜、专用的场地;其二,须聘任一位专理藏品的动物标本制作师但无合适人选。第一个问题在会所建筑物落成后得到解决;第二个困难则在 1874 年年初得到法国遣使会神父谭卫道(Armand David)训练的助手王树衡之后得到解决。因此,后来对于此学会和博物院的历史回顾都以 1874 为博物院的创始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学初兴之际,中国博物馆协会曾对当时境内存在的博物馆做过普查,其后出版的相关书籍皆认为以成立年代来看,亚洲文会博物院可算是中国第二个现代博物馆,仅次于由法国耶稣会士成立的徐家汇博物院③。

至于收藏与陈列品,这个博物院一开始是来者不拒、各类藏品兼有的一个陈列室。初期展品除了有各界捐赠的生物标本之外,也包括西方进口的新型机器的小尺寸模型,另外也不乏奇珍异宝、畸胎怪物等④。例如端方兄弟在政治变局中被杀之后,其被砍下的头颅在四川运回北京的路上曾在沿路各大城市展示,在上海时便是在该博物院展示⑤。尽管如此,这个博物院的收藏方向仍逐渐朝向以生物标本收藏为主,加上 1907 年后,负责人努力整理这方面的标本,故

①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第399页。

②名誉院长为不支薪职。

③例如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 1936 年版,第 25 页;曾昭燏:《博物馆》,正中书局 1943 年版,第 5 页。有关徐家汇博物院,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不多,读者可参考戴丽娟:《从徐家汇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3 年第 2 期。

④见博物馆开幕之初,《中西闻见录》《教会新报》中的报道。

⑤《两颗头颅万里行》,《申报》1912年1月22日。

整体而言,该院是一个以生物标本为主的自然史博物馆,尤其是以亚洲及中国地区的标本为收集重点。此情况在1933年博物院重新开幕后依然如此,尽管当时展品中也包含不少古物、历代钱币等收藏。

博物院成立之初,虽然尽量找有博物学兴趣或专长的会员来担任名誉院长一职①,但并非总能如愿。在最初三十年,主事者或因本身工作调职离沪、或因返乡、或因缺乏兴趣而频频换人,在缺乏固定人员持续经营的情况下,博物院到了十九世纪末虽已打响知名度,参观人数每年有数千,但整体已陷入老旧不堪的状态,直到1905年后才逐渐改善,并开始愈来愈专业化②。稍加整顿后的博物院不仅吸引的观众渐多,其中华人观众的人数暴增,更成为连续几年年度报告中被特别提出的事项③。参观博物院这类的活动在当地华人社会中逐渐普及的程度,还可从一份晚清的新小说中找到例证。先在报纸连载,后于1908年正式出版的《新石头记》中,长居上海的作者吴趼人安排重返红尘后闯入二十世纪的贾宝玉与其同伴在第二十七回"中非洲猎获大鹏,藏书楼综观古籍"里,将无意中捕捉到的稀世大鹏送给博物院,似乎就是以上海的徐家汇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院为原型来描写的④。

综观而言,在此博物院的历史中,有两位任期最久、贡献最多的院长,一位是 1905 年到 1921 年担任该职的斯坦利(Arthur Stanley, 1868—1931)⑤,另一位则是从 1922 年到 1941 年一直都实际负责博物院事务的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斯坦利出生于英格兰,1895年成为医学博士,1897年获得公共卫生学位证

①例如普瑞尔、福威勒(Albert Auguste Fauvel)、斯坦安(Frederick William Styan)、郝博逊 (Herbert Elgar Hobson)等人,皆是稍有名气的博物学家。

②博物院历届院长一览表,请见附表一。数据源为历届年会会议记录及博物院院长年度报告,但由于某些年度缺乏相关报告,因此调查结果并不完整,但已经弥补及更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③细节见附表三。

④见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六卷),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4—220 页。笔者于此要特别感谢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的崔文东先生提醒笔者注意此小说的相关章节。

⑤Arthur Stanley 当时无固定中文名,"斯坦利"是根据《上海租界志》的写法,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8 页。

书。他在 1898 年到沪,担任工部局卫生处(Health Department)第一任处长①。根据福开森(John Ferguson)在悼文中的回忆,他自己在 1905 年年初接替艾约瑟成为文会秘书后,试着说服斯坦利来担任博物院悬缺的名誉院长,希望借此重振陷于停摆状态的博物院②。斯坦利于该年成为文会会员,并开始担任博物院名誉院长;福开森则在工部局争取到一笔 500 两白银的特别补助,得以将博物院整修一番。斯坦利担任该职直到他于 1921 年从任职的工部局卫生处退休并离开上海为止,前后共十七年,是亚洲文会博物院成立以来担任该职最久的人③。他离开时将自己有关中国爬虫类、两栖类的动物标本捐赠给博物院。此外,他在 1920 年曾被选为文会会长,后于 1922 年获选为荣誉会员。

在他的任内,博物院历经大幅整顿。首先是清点现有的藏品,并且一一重制标签;其次是陆续增加了许多标本。1907年年初,海关关员同时也是亚洲鸟类专家的拉图许(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加入文会④,自愿帮忙整理博物院所藏的鸟类标本。当时他认为在原有的407件鸟类标本里,有203件都已经老旧损坏,无继续保留的价值⑤。经过他从1907年5月到1909年5月整整两年的努力,博物院的所有鸟类标本被重新整理、鉴定,同时也增添了许多新标本,使全部该类收藏扩增为1717件,其中做成立体标本的系列收藏(mounted series)达到了597件,其余1120件则是以一般填充标本或毛皮状态收藏。标本

①工部局于 1870 年始就设立医官,专门管理医药、菜场及污物排放等问题,但是卫生处迟至 1898 年才正式成立。斯坦利即该卫生处第一任处长。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 第 218—219 页。

^{2&}quot; Obituary", JNCBRAS, 62 (1931), pp. i-ii.

③斯坦利退休后,接任他为卫生处处长的戴维斯(Charles Noel Davis)也接下他在亚洲文会博物院的任务。

④拉图许为爱尔兰人,其祖先为法国卡尔文教派信徒,在宗教改革期间因恐遭迫害而移民至爱尔兰定居。1861年,他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图尔(Tours),后在英国巴斯(Bath)受高等教育,于1882年抵达中国,任职于中国海关,直到1921年才返回爱尔兰定居,后于1935年死于西班牙马略加附近海域。其生平梗概可见"Obituary: 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 *Ibis*, 77, 4 (1935), pp. 889-890。

⁽⁵⁾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 "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JNCBRAS*, 40 (1909), p. 71.

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增加,除了拉图许和斯坦利的努力以及各方的捐赠外,主要还应该归功于新进博物院服务的田野捕猎好手兼标本剥制师唐启旺兄弟。追溯唐家兄弟与亚洲文会博物院之间的因缘,仍得回到拉图许身上。原来,是拉图许加入博物院的工作后,了解到院内缺乏标本管理员,他便引介了他之前在福州工作时认识的田野捕猎助手唐启旺及其兄弟到博物馆工作。唐家兄弟二人因此从1907年10月开始到博物院就职①。此举也无意中开启了唐家前后五代男丁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山大学生物系、复旦大学生物系、武汉大学生物系、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等单位担任动物标本剥制师的传统。为了了解这看似无意之事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历史意义,我们得要了解动物标本剥制技术在当时的发展概况。

三、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培育与传承

如前所述,亚洲文会博物院起初就是因为缺乏适当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兼管理员而延迟开幕。不过从开幕后《申报》的报道,多少可看出博物院为当地社会带来的新颖经验:

泰西各大城池夙有成例,凡在该地方人,必公建一院,将飞禽走兽以及各动物并列于内,以便博物者随时赏玩。如在府城,则将阖郡之物实之;如在都城,则将天下之物实之,名曰博物院。现在旅居上海之西商亦仿效泰西规模,在本埠设立一院,将中国与东洋各物齐集聚院中,事虽创始,而所罗列者业已不少。计属毛虫者,有震泽湖旁之野猪小鼠等;羽族者,有鹰鹊麻雀等;又有水族中名物,不能殚述。余如螳螂、蚱蜢、蝴蝶之类亦各分其种,各标其名。每一物件系从何处得来,何人相赠,必书明悬贴于上。中外人有往观者,俱不取值也。珍藏羽毛各类,西国向有妙法,虽皮已干枯而毛

①唐氏兄弟的到职时间,见 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 "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JNCBRAS, 40 (1909), p. 69。

可不落。现在此法华人已得之。且又从国外购到玻璃眼睛,故无论是何异 兽珍禽,一经装点,变栩栩然大有生气。①

当时中文似乎还没有"标本"一词,此文未具名的作者因而是用"物""对象"来表达。但是这位作者已经注意到:要保存动物皮毛必须有"妙法",而这个"妙法"西国已有,而且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且有华人取得。此外,文章中也提到从国外购入玻璃眼睛,而且大部分的展示动物,一经此装点,就会"栩栩然大有生气"。

由于至今仍无相关研究,我们不易得知中国古代究竟有无制作立体动物标本的技术。不过,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上海的华人既然已注意到这个博物馆中的展示手法,而且认为是西国传入的新事物,此处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动物标本剥制技术(taxidermy)在西方的发展史。

以字源来看, taxidermy 是从希腊文 taksis 和 derma 两字结合而来,其中 taksis 意指整理、布置, derma 就是表皮, taxidermy 指的是完整保存死去动物毛皮,将之整理并制成标本的技术,可以视之为是保存动物遗体的方法之一。不过,若与以香料药物为尸体防腐剂并制成木乃伊的手法相较,动物标本剥制术企图做到的是复原动物生时的形貌和姿态,也就是要"起死回生",而不只是保存其尸体。这类技术在十八世纪欧洲逐渐发展,但各家方法不一^②,而且由于防止虫害的化学用料种类和剂量不固定,当时制作的标本极易变形、腐朽,不利长期保存。直到在法国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工作的动物学家杜弗黑讷(Louis Dufresne)确认砷皂(arsenic soap)可以长期防止虫害、妥善保存动物皮毛后,相关的技术才逐渐标准化。1803 年,在戴泰维勒(Jean-François Pierre Déterville)主编的《新自然史辞典》(Nouveau dictionnaire d'histoire naturelle)中,就可以看到杜弗黑讷所撰写的 Taxidermie 词条以及砷皂制作配方。1820 年他有关 taxidermy的这篇文章单独成册出版,英国人注意到后很快将之翻译,在1823 年出版英译

①《创设博物院》,《申报》1875年11月4日。

②关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关的争议,见 Paul Lawrence Farber, "The Development of Taxidermy and the History of Ornithology", Isis, 68 (1977), pp. 550-566。

本,使得这种方法广泛流传,成为主流①。对于杜弗黑讷和他的同好来说,保存动物的毛皮,不只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有时也是为了它们所引起的美感经验。尤其是鸟类,由于其丰富多变的羽毛颜色以及优美的姿态,使得早期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常以它们为对象,而此技术的渐趋成熟有助于标本的长期保存与数量累积.也因此促成鸟类学专科的建立②。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这样的技术逐渐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流传,美国的自然史学家在该世纪中期也陆续加入,但是如何制作成生动的立体动物标本仍属于各家独门绝活,制作过程中各环节的诀窍往往成为秘技,并不外传。这也是为何相关技术迟未标准化,也未普及的原因③。十九世纪中叶,透过万国博览会的公开展示和竞赛,使得该项技术渐趋精良和普及④。此外,成立于 1880 年的美国动物标本剥制师协会(The Society of American Taxidermists)的推动,使得此技术朝向标准化、专业化发展,而且逐渐取得社会认知度⑤。当时,许多田野

①杜弗黑讷并非第一个使用砷皂的标本制作者,但却是最早将标准配方公诸于世的人。另外有关此方法从法文被译成英文而在大西洋两岸广泛流传的情形,可见 L. C. Rookmaaker, P. A. Morris, I. E. Glenn, P. J. Mundy, "The Ornithological Cabinet of Jean-Baptist Bécoeur and the Secret of the Arsenical Soap",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33, 1 (2006), pp. 146-158。

②Paul Lawrence Farber, "The Development of Taxidermy".

³ John Rawley, Taxidermy and Museum Exhibition, London/New York, D. Appleton, 1925, p. xv.

④万国博览会的展示结合了美术、科学、商业等不同目的,给予这类展品接触大众的机会,也往往是相关领域工作者仿效的对象。例如英国鸟类学家 John Hancock (1808—1890) 所制作的一系列鸟类标本就在 1851 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中极受瞩目。法国哺乳类动物专家 Jules Verreaux (1807—1873) 本身也是有名的动物标本采集者和剥制师,他所制作的一件名为《遭到狮子攻击的阿拉伯信使》(Arab Courier Attacked by Lions) 的标本展示就在 1869 年于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获得金牌奖。这个标本随后被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购藏,并且被借到美国不同博物馆展示,成为观摩对象,最后由位于匹兹堡的卡内基自然史博物馆 (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买走,保存至今。

⑤该协会的成立讯息可见 William Temple Hornaday,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Taxidermists", Science, vol.os-1, 4 (1880), pp. 37-38。该协会成立后,在 1880—1884 年间于罗彻斯特、纽约、波士顿各地共举办了三次竞赛性的大型展览,其目的是让同好能够互相切磋标本剥制技术,提升水平,同时也提升该职业的社会认知度。

射猎的爱好者都会最基本的剥制和保存技术,到了十九世纪末,专门书籍如 The Art of Taxidermy 的出版与畅销,进一步将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相关技术公诸于世,由此可见该技术社群已累积有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对更精进的技术有所需求①。当时专业的动物标本剥制师认为,制作精美的动物标本不仅需要有解剖学的知识,也要有雕塑家的技术,其作品应该与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而标本制作师应该与艺术家相类,而非仅是艺匠。但是这样的看法在十九世纪末仍未被广泛接受。

从当时国际上动物标本制作的发展来看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十九世纪末要在中国当地找到相关人才是会有困难的。从现有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无从得知第一任动物标本剥制师王树衡在该院服务多久,仅知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亚洲文会博物院再度面临欠缺标本管理人员之窘境。根据当时名誉院长 Henry Vosy-Bourbon 的年度报告,博物院一度想从澳洲或日本征求相关专家,但由于经费有限,一直无法觅得理想人才,因此更坚定了博物院应该自行培训中国当地人才的想法②。博物院在 1897 年又雇用另一位助手,但是这方面的人员配备一直不稳定③,直到 1907 年唐家兄弟的到来,事情才出现转机。

唐氏一家来自福建福州,唐启旺的父亲唐春营(1845—1916)本在闽江以渔猎为生,他有时会把捕获的鸟禽羽毛整理后卖到城内的洋行,以补贴收入,拉图许便是经由此渠道而与之结识。由于拉图许非常欣赏唐氏父子的捕猎身手,便进一步雇用他们在野外猎集动物标本,并传授他们保存和制作标本的技术。除了拉图许,同样以收集中华地区鸟类标本有名的里克特(Charles Boughey Rickett)和斯坦安(Frederick William Styan)也曾经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雇

①该书在 1898 年出版,是由在该博物馆剥制部门服务许久的 John Stewart Rowley 写成,旋即成为该领域的人士必用的参考书。同一作者后于 1925 年写成 Taxidermy amd Museum Exhibition 一书,进一步示范动物标本与博物馆展示柜制作的各项必要步骤。

②Henry Vosy-Bourbon,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ns., 27 (1895), pp. 222-223.

③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XIX, 5 (1933), p. 221。文中提到的是 Mr. S. Chou,但未写出中文名。

用唐家兄弟到福建武夷山一代采集标本①。由于拉图许一直无法正确喊出唐启旺(1870—1932)的名字,唐干脆让自己唤他旺旺,唐也以此名扬声于外,所以后来中外文献皆以唐旺旺一名载之②。拉图许在 1925 年至 1935 年间出版了两厚册的《华东鸟类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 China),其中收录中国沿海省份 750 个种和亚种的鸟类,书中所提及的模式标本(type specimen)有许多即是唐氏父子的采集成果。这位专研中国地区鸟禽的专家因此特别在该书第二册扉页上附上唐氏一家的照片(摄于 1897 年 9 月 30 日),让我们得以一睹这些田野工作的无名英雄之真面目③。

在亚洲文会博物院,唐启旺一直服务到 1921 年,因被新成立的厦门大学动物博物院挖墙脚而离开^④。当时博物院院长一职由戴维斯义务担任,而实际上则是由甫至上海定居的兼任院长苏柯仁主事。唐旺旺离职后,苏柯仁聘用唐旺旺之子唐仁官(又名唐瑞芳)接替遗缺,并加强训练其标本制作技术,而唐仁官的弟弟和堂弟唐瑞玉、唐瑞耿则担任其助手,从旁学习⑤。唐仁官之子唐兆魁、唐兆杰后来也继承父业,继续在亚洲文会博物院服务。唐旺旺于 1932 年年初过世时,苏柯仁特别在他主编的《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发表一篇纪念文,并附上唐之相片。文中提到,唐旺旺兄弟六人皆

①这三位当时被公认为研究中国鸟类的三大家,见 N. B. Kinnear, "Mr. C. B. Rickett", Nature, 3 June 1944, p. 677。

②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网络上提供的简短数据,将其生卒年标为 1886—1933,见上海市地情资料库: 唐旺旺(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429/node4432/node70711/node70715/node70723/userobject1ai54307.html, 2010/1/24 浏览)。但根据苏柯仁当年提供的资料,唐旺旺似是出生于 1870 年农历二月,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ang Wang Wang", The China Journal, XVI, 2 (1932), pp. 57-59。

③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 China,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vol. 2, 1931–1934, frontispiece.

④有关该博物院简介,可参阅:《厦门大学七周纪念特刊》,厦门大学编译处周刊部,第 52 页。 唐旺旺的侄子唐瑞惠也随他在该院工作。

⁽⁵⁾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Personnel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XIX, 5 (1933), p. 225.

成为田野自然标本采集者,而他的三个儿子也被培训为标本制作师^①。从目前所得资料可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于 1928 年成立后,唐家第三代唐善康、唐瑞玉即到此机构担任标本制作员,同时也被派往不同地区协助采集标本^②;"中央研究院"于 1929 年开始在南京筹备自然历史博物馆后,唐氏家族第三代的唐开品、唐瑞金也曾在此机构服务^③。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于 1929 年欲建立标本馆,便是请唐启旺的弟弟唐启秀主持其事,其子孙陆续加入经营,将武大标本馆建设成中国自然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若从唐春营算起,唐家在动物标本制作方面的技艺传承至今已有五代,在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见到唐家人的身影。而且,唐氏家族中多人成为生物学教授,例如在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的唐兆和,是唐家第四代;在复旦大学的唐仕敏、上海师范大学的唐仕华,以及在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的唐思贤则是第五代^④。

根据二十世纪前期文会博物院的年度报告,有了专门技艺的唐氏兄弟不只是为该博物院工作,他们也接受当地喜爱射猎的运动家(sportsmen)的订单,把客户猎获的动物制成可观赏的标本。苏柯仁在1927年的报告中就提到唐仁官在博物馆为一些猎友将猎物制作成标本,其收入不仅足以支应他自

①唐启旺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唐瑞芳(唐仁官)、唐开品、唐瑞玉。唐开品曾受雇于苏柯仁,到福建、江苏、安徽、浙江等地采集标本,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后,唐开品于 1929 年开始受雇于该机构担任标本采集员和剥制员。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ang Wang Wang", p. 58。

②见陈胜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第215—216页;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③见:《国立中央研究院职员录》,民国十八年(1929),第29页。

④见胡鸿兴:《唐家的鸟:记武汉大学生物系标本室高级工程师唐瑞昌》,《大自然》1981 年第 2 期;吴峥嵘:《百年"标本唐"》,《档案春秋》2007 年第 2 期;丘濂:《标本唐:一个家族的标本制作传奇》,《三联生活周刊》2010 年第 579 期;李祖凤:《标本世家的百年沧桑:六代人缔造的生物界传奇》,《知识家》2013 年第 1 期;袁菁:《崇明东滩,"标本唐"的身影》,《城市中国》2016 年第 75 期。2009 年,"唐氏动物标本制作技术"人选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是唐兆和与女儿唐庆圆以工作单位名义申请的,见袁菁:《标本唐:旨意与意志》,《城市中国》2016 年第 74 期。

己的薪资,甚至可为文会增加收入①。在 1932 年的报告中,苏又提及此事。当时博物院所在的建筑物因老旧且遭白蚁侵蚀,故拆除后在原地重建。博物院在工程期间暂时关闭,将所有藏品另存他处,所以标本剥制师的工作量较少,苏柯仁认为接外单可以让剥制师本身赚些外快②。在 1935 年的报告中,苏柯仁具体提到了博物院中设有标本制作工坊(Taxidermist's Shop),并说明他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制作猎物标本、将动物毛皮制成地毯等,而若要将动物标本置于玻璃展柜中,则可选择无背景或有自然生态背景图的展柜。这些项目都有公开定价③。

除了为射猎者服务外,其他博物馆也可以订制。例如在 1934 年 6 月,亚洲文会博物院就曾帮震旦博物院把送来的一张象皮做成立体标本^④,费用是三元^⑤。这项在文会博物院看似稀松平常的大型哺乳类动物标本制作的工作,对于同时期其他博物馆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同一年的《西湖博物馆馆刊》中,记载该馆一具蹩脚的大象标本遭到许多观众批评的情形,博物馆工作人员为此只好出面说明其制作过程如何不易⑥。两相比较之下,可以想见亚洲文会博物院训练出的剥制师技艺之高超,因此他们可能也是许多博物馆或研究机构亟欲争取的对象。在 1936 年的报告中,苏柯仁提到标本工坊的工作量大,那

①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59 (1928), p. iv.

②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3 (1932), p. v.

③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6 (1935), pp. vii. 苏柯仁于此提供的是该年度新调涨后的价格,例如小型鸟禽类标本要 1 至 2 元、大型鸟禽类要 5 至 7. 5 元、狐狸、山猪等中型哺乳类动物要 10 至 15 元,更大的就依尺寸大小,要价 20 至 50 元不等。至于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许多崇尚射猎的上层阶级家庭喜欢用来做室内装饰的墙上兽首标本,价格则在 10 至 30 元之间。

⁽⁴⁾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6 (1935), p. vii.

⑤费用问题未见于年度报告,仅在苏柯仁与当时震旦博物院院长郑璧尔神父(Octave Piel)的往来书信中被提到。见上海档案馆,震旦大学档案 Q244—470。由于当时币制混乱,尚无从得知是否是以银元计。

⑥原壮、中旬:《本馆象标本制作的经过》,《西湖博物馆馆刊》1934年第2期。

是因为当地中小学也向他们订制动物标本,作为教具①。到了 1938 年,苏柯仁在年度会议中表示,标本制作工坊成立后订单不断,足以应付博物院本身的开销,有时还有盈余。但是晚近因为受到战事影响,射猎者无法像以往一般自由地到野外射猎,因此工坊收到的订单数量不如前几年②。在工坊之外,博物院在1937 年间还设置了一个小型礼品店(Museum shop),民众可在店内买到小型鸟类和动物标本,还有一些古董、钱币、艺术品等③。其营收据称可让其自给自足④,甚至逐渐可有盈余⑤。

事实上,从1933年博物院重新开幕后,动物标本剥制师的薪资就大幅提升。根据不完整的文会财务报告,其薪资在1875年是141.06两,1907年大约267元,到了1933年有647.5元,而1934年就跃升为1120.30元,1937年则有1260元,足见此技艺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一种可赖以维生的专业⑥。

四、苏柯仁与博物院的黄金年代

这个博物院能从近于废弃状态变成可自负盈亏,这中间的功臣,除了前面提到的斯坦利之外,应属 1922 年进入该院工作的英籍探险家兼自然史学者苏柯仁。苏柯仁在 1885 年出生于山西太原,他的父亲是在中国布道逾四十年,曾任袁世凯儿子家教的浸礼会教士苏道味(Arthur Sowerby)。他的曾祖 James de Carle Sowerby (1787—1871)为英国皇家植物学会(Royal Botanic Society)的创始

①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7 (1936), p. v. 根据曾在此博物院服务的唐子明老师提供的资料,当时在圣约翰大学生物系任教的朱元鼎教授、沪江大学生物系的郑章成教授,还有复旦大学生物系卢于道教授等都经常送来动物材料,要求制作成教学用的标本。其中朱元鼎、卢于道两位教授均曾担任亚洲文会博物院理事会理事。

②Arthur de Carle Sowerby, "Royal Asiatic Society Meeti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25 Jan. 1939.

⁽³⁾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8 (1937), p. vi.; "Royal Asiatic Society as Cultural For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0 June 1937.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9 (1939), p. xii.

⁽⁵⁾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70 (1940), p. vii.

⑥同一年(1937年)文会图书馆馆员薪资为1800元、暖气管理员300元、电梯服务员264元。

人之一;高曾祖 James Sowerby(1757—1822)则是英国植物学的奠基者之一,其手绘的英国植物图谱与矿物图谱极富盛名①。苏柯仁在中国度过童年,能说流利的中文②;在太原、芝罘等地受过教育,直到十五岁才被父亲送回英国接受高中与大学教育。但他未完成大学学业即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探险,直到1905年才返华与家人团聚。1906年—1907年间,他曾在伦敦会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任教约一年半,并协助学校附设的博物院做标本收集及整理工作③。1908年年初寒假结束后,大约在一二月间,他与负责英国贝福德伯爵东亚探险队(Duke of Bedford's Exploration in Eastern Asia)④的美籍探险家安德生(Malcolm Playfair Anderson)正式会合,受其雇用,两人一同前往西北野外考察,为大英博物馆收集东亚动物标本。在此行中,他担任安德生的助手,向后者学习了更多捕捉和保存动物的精进技巧,还发现了一只前人

①苏柯仁姓名中的法文部分 de Carle 即来自其高曾祖母,即 James Sowerby 之妻 Anne de Carle,她是一位移民的法国卡尔文教徒之后代。此外,苏柯仁的祖母 Grace Séguier 是法国当时总理大臣 Pierre Séguier 的女儿,因此苏柯仁可说是来自一个具有英法双重背景的家族。关于其家族渊源,可见 Richard Raine Sowerby, Sowerby of China: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1956。关于其生平简介,还可见 Keith Stevens, "Naturalist, Author, Artist, Explorer and Editor and An Almost Forgotten President: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President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194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38(1998), pp. 121-136。

②根据 Keith Stevens, "Naturalist, Author, Artist, Explorer and Editor and An Almost Forgotten President: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President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1940", p. 122。

③天津新学书院创办于 1902 年,而其附设博物院创办于 1904 年,即一般所知的华北博物院, 地址在当时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78 号,是中国少数在辛亥革命前成立的博物院之一。见中 国博物馆协会编:《中国博物馆一览》,中国博物馆协会 1936 年版,第 52 页。有关此博物 院初期的藏品内容,亦可见其出版的 Guide to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④此探险队由贝福德伯爵(Herbrand Russell, 11th Duke of Bedford, 1858—1940)赞助,主要由大英博物馆哺乳类部门的 Oldfield Thomas (1858—1929)统筹,田野领队由美籍探险家兼自然史学者安德生担任,目标则是为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门、伦敦动物学会等机构搜集东亚的动物标本。安德生在 1904 年至 1911 年间陆续前往日本、韩国、济州岛、库页岛、菲律宾、中国山东、直隶、内蒙古等地考察。贝福德伯爵本身即为伦敦动物学会主席,任期长达 37年(1899—1936)。

未见,经鉴定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跳鼠(Dipus sagitta Sowerby)①。历经这次田野考察后,他从一位自学的探险家变成一位专业的标本采集者,因为他进一步了解了欧洲自然史博物馆的收藏系统,使自己在田野的观察与采集工作能与博物馆的收藏需求顺利接轨。

在此之后,他与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保持联系,但同时也接受其他探险队的邀请,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美国富商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 1877—1956)在1908年组织的探险队。这支探险队于1908年8月至1909年9月间陆续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进行黄土高原腹地考察②,行程中所收集的标本则多寄往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负责的美国国家博物馆(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动物部门保存和研究。在此之后,苏柯仁终生与克拉克维持良好的友谊。克拉克长期出资支持苏柯仁在中国各地的田野踏查工作,后者则把他途中所收集的动物标本都寄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博物馆。苏柯仁在此行之后陆续出版多本中国与周边的田野调查著作,奠定他在中国博物学领域的名声③。

他在1915年成为文会会员④,亦曾于1917年前后为徐家汇博物院鉴定大

①他与这个考察队的初步接触与合作经历都写在他对该队领队安德生(Malcolm Playfair Anderson)的纪念文章中,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A Pioneer Naturalist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XXXI, 5 (1939), pp. 240-247。

②该考察队于 1908 年 5 月 16 日从山西太原开始工作,直至 1909 年 9 月 12 日宣告结束。但是苏柯仁是在 1908 年 8 月间才正式加入。关于此探险旅行,可见 Robert Sterling Clark,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rough Shê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 London, T. F. Unwin, 1912。此书有中文译本。

③例如: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Fur and Feather in North China,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14;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London, A. Melrose, 1918;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Exploration of Manchuri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1;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22–1923。

④当时地址登记在天津,见 JNCBRAS,1915 年第 46 卷会员名单。

型哺乳类动物标本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西北诺曼底担任中国劳工军团(Chinese Labour Corps)联络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重返中国后,他决定长居上海,并且从 1923 年年中开始兼任文会博物院名誉院长(Joint Honorary Curator)②,协助戴维斯处理斯坦利留下的工作。他于 1927 年成为正式的名誉院长,此后一直担任此职至 1946 年为止③。从 1935 年到 1940 年底,他还同时担任文会的会长。此外,他在福开森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于 1923 年开始出版《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其内容不只包含科学与美术报道与评论,也反映上海的时事与都市发展状态④。日军在 1941 年占领上海租界区后,苏柯仁遭到软禁,但他持续研究和写作工作,并将成果交给震旦博物院发表⑤。战后他继续住在上海,直到 1946 年秋,因长期的关节炎困扰而决定回英国休养⑥。后又因气候等问题,他辗转落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从 1949 年开始在美国国家博物馆

①他曾经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数篇,例如: "Notes on Heude's Bears in the Sikawei Museum, and on the Bears of Palaearctic Eastern Asia", *Journal of Mammalogy*, 1, 5 (1920), p. 225; "On Heude's Collection of Pigs, Sika, Serows, and Gorals in the Sikawei Museum, Shanghai",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917, pp. 7-26。

②见 Charles Noel Davis, "The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54 (1923), p. viii。1932年,苏柯仁将头衔从 Honorary Curator 改为 Honorary Director。

③博物院在1941年年底曾因战争而暂停活动,到了1946年才又勉强恢复运行。

④《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发行于 1923—1940 年,为一英文刊物,目标是帮助在华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并报道当时进行中的各种科学、艺文、休闲活动。发刊时原为双月刊,每期有百余页,1925 年起改为月刊,每期约 60 页。由于原名太长,1927 年起英文名被缩短为 The China Journal,但封面中文名称—直维持原样,至 1935年才更改为《中国杂志》。有关此刊物的简介,可见江冬妮:《东方文化的使者:〈中国杂志〉简述》,《都会遗踪》2011 年第 2 期;李天纲:《导论》,上海图书馆编:《中国杂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7 页。

⑤他在震旦博物院的刊物中发表了八份研究成果。见 Richard Raine Sowerby, 1956, p. 56。 有关其研究内容的讨论,亦可见于他与数任震旦博物院主事者的书信往来,上海档案馆, 震旦大学档案 Q244—470。

⑥他在离华前将他自己收藏的大量生物标本、古文物和丛书悉数捐赠给震旦博物院。他对此机构的重视与信任由此可见。震旦博物院也为他所捐赠的藏品另辟一个以他为名的陈列室:The Sowerby Hall。见 Joseph Dehergne, «Le fonds Sowerby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 24 (1945), pp. 812-815。

提供的办公室工作,直到1954年8月16日病逝为止。

对于文会而言,苏柯仁最大的贡献是说服工部局让文会拆除并重建会馆^①,并且在文会因此负债之后,与其他主要会员一起持续向各界募款来还清债务。对于苏柯仁来说,会馆重建的意义之一,是博物院得以扩大,整体重新规划。1933年11月15日重新开幕的博物院,配合多项活动的举行,果然引起中外报纸的注意^②(彩图四)。

新启用的博物院展厅内最吸引人的,就是它有许多带有动物栖地背景的展柜,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大猫熊(the Giant Panda)展柜③(彩图五)。这个展柜被安置在新展厅最底处,但是朝着展厅人口,这是最重要的位置,任何进入展厅的观众透过走道第一眼就会看到它④。当时国际动物学界对于大猫熊的知识相当有限⑤,世界上能够拥有大猫熊标本的自然史博物馆更是少之又少⑥。在谭卫道神父于 1869 年在穆坪获得一张猫熊皮与头骨,并将它们送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馆鉴定之前,世上仅有极少数猫熊产区的人曾亲眼见过这种离群索居的动物。此后直到 1928 年前,仍极少有西方人曾经亲眼见过活的猫熊⑦。1928 年—1929 年,由罗斯福总统

①他与一些会员从 1924 年左右就开始倡议并规划此事,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56(1925), p. viii。会馆在 1931 年 7 月开始拆除工程,10 月 20 日举行奠基仪式。新馆在 1933 年 2 月 23 日落成。

②博物院在开幕前一天先招待中西各报记者参观,开幕当天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在该处三、四楼举行开幕礼,邀中外人士及该会会员前往观礼。下午四时三十分,在伍连德堂举行招待会,由院长苏柯仁讲演。《申报》与《北华捷报》都为此做了相关报道;在此因篇幅关系,不一一列举。

③其后展柜数量仍陆续增加,详细展品可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hina's Natu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36。

^{(4) &}quot;RAS as cultural center in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24 July 1935.

⑤关于学界对大猫熊知识的缓慢进展,可见亨利・尼克斯(Henry Nicholls),黄建强译:《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猫熊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新北市:八旗文化 2011 年版。

⑥苏柯仁在其文章中提到在 1928 年以前拥有猫熊标本的博物馆,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Hunting the giant panda", *The China Journal*, XXI, 1 (1934), pp. 30-32。

②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panda or cat-bears", *The China Journal*, XVII, 6 (1932), pp. 296-299.

(Theodore"Teddy" Roosevelt)的长子(Theodore"Ted" Roosevelt)和次子(Kermit Roosevelt)任领队,由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赞助者凯利(William V. Kelly)资助的一支亚洲探险队(Kelley-Roosevelts Expedition)在美籍华裔工程师杨杰克(Jack T. Young)与当地猎人的协助下①,成功地射杀一只大猫熊并将之运回美国,使芝加哥的这个博物馆成为美国第一个成功地到原产地猎获大猫熊标本的博物馆②。至于亚洲文会博物院所获得的大猫熊毛皮,则是来自杨杰克在 1932 年的另一次探险后的赠予③。在连中国人都还不太清楚大猫熊模样、属性和习性的时代,亚洲文会博物院的这个栖地展柜在当年自然是备受瞩目。不过,菲尔德博物馆之举引起美国许多自然史博物馆的跟进,导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捕猎大猫熊风潮,致使原本数量就不多的猫熊面临绝种危机。观察到这个现象的苏柯仁于 1938 年开始在《中国杂志》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立法,管制捕杀和出口大猫熊的行为④。

有了一系列的新展柜后,亚洲文会博物院更加注重其社会教育的功能。例如在 1934 年,他们在原有的英文展品标签和说明外,尽量附上中文翻译⑤。除此之外,该机构从 1935 年春开始,以上海当地的中、西学校的学生为主要对象,举办博物馆系列演讲(Museum's talks)的活动:1935 年三月、四月间,每周三傍晚在博物院演讲厅举行,共举行了八次;1936 年二月底至五月初,则举行了十二次⑥。其中,苏柯仁本人主讲的次数最多,而每一部门的名誉管理者(Honorary

①杨杰克之弟杨昆汀(Quentin Young)后来协助 Ruth Harkness 于 1936 年冬捕获—只幼年猫熊,使得这位美国女性成为将活体猫熊带到西方国家的第一人。有关此事,苏柯仁在其主编的杂志亦有—手报道,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A baby panda comes to town", *The China Journal*, XXV, 6 (1936), pp. 335-339。

②关于此次的探险之旅,可见罗斯福兄弟本身的叙述: Theodore Roosevelt, Kermit Roosevelt, Trailing the Giant Pand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9。

^{3&}quot;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64 (1933), p. iv.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Live giant pandas leave Hongkong for London", The China Journal, XXIX, 6 (1938), pp. 333-334; "Further Hunting of Giant Pandas Forbidden", The China Journal, XXX, 5 (1939), p. 313.}

⁽⁵⁾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6 (1935), p. iii.

⑥讲题与讲员一览表,见附表二。

keeper)也加入演讲者行列。这类演讲大多有博物院内的展品来配合说明;当无实物可让观众观赏时,则辅以黑板画图讲解①。听众虽以学生为主,但也不乏成人。当时上海主要的中外媒体都曾报道此活动。例如 1936 年 2 月 27 日的演讲,题目与"北京人"有关,而翌日的《申报》即加以报道:"此项谈话,须数次始能讲竣……且用该院陈列品表证一切……有志学术者不可不往一聆,以增学识也。"②

有关北京人展柜内的展品来源。根据《北华捷报》的相关报道,1934年11月中,博物院收到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委托胡适赠送给亚洲文会的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博物院将该头骨与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头骨,以及其他猿猴头骨并置于展柜内,以供参观者观察比较③。另外,博物院还委托当时在上海、香港、新加坡颇具知名度的 W. W. Wagstaff & Sons 雕塑公司制作一个北京人拟态展柜④。展柜所呈现的场景是:北京人在所居住的洞穴附近,拿着锐利的石器,与靠近洞穴的利牙猛兽对望。这个展柜于1935年3月在博物院正式展出,吸引了媒体的报道,也吸引上海地区不少民众前往参观⑤。苏柯仁在1936年的那场通俗演讲就以北京人为主题,配合两个展柜,向听众讲述人类起源、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史前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⑥。在1936年,由苏柯仁主编并出版的博物馆指南中也特别提到北京人的发掘故事,把当时与中国史前人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Museum Lecture Series Completed", The China Journal, XXIV, 6 (1936), p. 389.

②《博物院谈话:中国元始祖先北京人》,《申报》1936年2月28日。

^{3&}quot;Peking Man to Be Shown Here: Replica of Skull Donated to RAS Museum", North-China Herald, 14 Nov. 1934.

④William Wheatley Wagstaff (1880—1962)为英国雕塑家,其专长领域包含建筑雕饰、石雕、金属类雕塑等。他于 1920 年定居上海,后来在两个儿子 Donald 和 Alec 的协助下,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于香港、新加坡设分公司。亚洲文会博物院的这个北京人拟态展柜主要是由 Donald Wagstaff 制作并赠予博物院。

^{(5) &}quot;Peking Man to Be Shown Here: Replica of Skull Donated to R. A. S. Museum", North-China Herald, 14 Nov. 1934; "Interest Growing in Shanghai Museum: Novel Attraction in Display of 'Peiping Man' in Cave", North-China Herald, 27 Mar. 1935; "R. A. S. as Cultural Centre in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24 July 1935.

^{6 &}quot;Museum Lecture Series Completed", The China Journal, XXIV, 6 (1936), p. 389.

类有关的最新知识透过博物馆展示传播给大众(彩图六)。

综览当时上海民众参观博物院后的记叙,多数会提到这些带有动物栖地背景的玻璃展柜。例如在1938年的《上海青年》中,有作者特别提到:"如白熊,即大猫熊……其他如犀头、山羊、马熊、狸子、水獭……均装置在玻璃窗内,以树木石子等配合布置,形如真熊,很是自然,精巧极了。"①另如《科学趣味》所刊载的参观者印象:"四面都排满著特制的大玻璃橱,数百千种不同的鸟兽,都显著活动的姿态,旁边更衬托著天然的景物。处身其中,宛如走进了大自然中的鸟兽世界,充分地表现出各种动物,也都为了生存竞争而酿成残酷的战斗。其中如鹰隼的攫食小鸡小动物等,所以这不但是使我们能看到鸟兽的形状,就是鸟兽们的生存活动,也能了如指掌。"②

《北华捷报》认为,这类展柜能够将各类惟妙惟肖的动物标本置放在其原生的自然环境中展出,而当时在远东只有这家博物院拥有此种装置③。为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管亚洲文会博物院的苏柯仁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动物标本?这样的展示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样的观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溯这类展柜在当时自然史博物馆中出现的历程。

五、栖地展示方式的引进

关于这些报纸报道、观众感想中所提到的玻璃展示柜,在当时的中文语汇中并没有固定的指称词,苏柯仁自己在其英文书写中多是以 scenic case 或是 habitat group 来指称,有时也用 diorama 一词。英美博物馆界后来则统称这类装置为 habitat diorama(暂译为"栖地展示柜")④。对于博物馆来说,要制作一个具有栖地背景、主角标本、水木花草等前景的完整栖地展示柜,严格说来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较多的人力和经费,还需要结合以下几种知识和技术条件:1.制作静态或动态的拟真动物标本,尤其是能够呈现动物平日生活样貌的标本;2.背景画

①《晨光团参观博物院记》、《上海青年》1938年第38卷第23—24期。

②赵锦福:《上海博物院参观记》,《科学趣味》1940年第3卷第2期。

^{3&}quot;RAS as Cultural Center in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24 July 1935.

④今日中国博物馆界习称之为"生态景箱"。

的制作,这需要擅长于透视和全景画的人才;3.对动物本身以及对相关栖地的知识,包括在野外的实际观察和对同一环境内其他物种的认识;4.对相关制作材料的掌握,亦即材料科学的知识。

一个质量精良的栖地透视展示柜往往可以达到幻觉效果,让观看者感觉仿佛亲临动物在野外的栖息地,看到它们正在活动的场景。在这样的制作中,拟真的动物标本是最主要的元素,然而并非世界上能够生产精美动物标本的自然史博物馆都会采取栖地透视展示柜的展出方式。例如在法国,其动物标本剥制术并不落后,甚至有一段时间领先各国,但由于其自然史博物馆被定位为从事比较研究和分类的实验室,因此以大众教育为要求的栖地透视展示装置在法国并不普遍。在英国,某些动物标本剥制师仍然将科学要求的标本和带有戏剧效果的艺术标本(例如在万国博览会展出者)分开看待,担心逼真呈现动物动作的场景设置会影响其科学价值,因此自然史博物馆的展示倾向于依循古典的同类动物系列陈列方式,即使有类似栖地装置的雏形,也未见大量发展①。

综观世界主要的自然史博物馆,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普遍使用栖地透视展示装置的地区有二:一是瑞典,这种装置约在 1893 年开始流行于该国的生物博物馆;另一是美国,该国在十九世纪后期所建立的自然史博物馆大多实行这种展示方式②。苏柯仁的展示概念多少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他从 1908 年参加克拉克探险队之后,就持续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保持合作关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他也与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派出的中亚考察团(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成员有书信往来——或互相帮忙鉴定标本,或互寄出版品,或是告知近况等等。曾任中亚考察团团长,也在 1935 年后担任该馆代理馆长的安得思(Roy Chapman An-

①Karen Wonders, *Habitat Dioramas*: *Illusion of Wilderness in Museums of Natural History*, 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1993, pp. 41-42, 45.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大英博物馆内的生物类标本长期与其他种类藏品保存于同一建筑体内,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区的展馆完成,才被独立分出保存与展示,但直到 1992 年,自然史博物馆名义上一直隶属于大英博物馆。这也是为何在国际自然史博物馆界,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之地位一直无法与巴黎的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相提并论的原因。

②Karen Wonders, Habitat Dioramas, p. 9.

drews),甚至曾在两人往来的书信中认为苏柯仁就像是该馆在中国的"非正式代表"(an unofficial representative)①。

在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然史博物馆建立潮流中,较早成立的应该就是位于纽约市的这个自然史博物馆,时间是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的 1869 年②。之后则是于 1884 年开放,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以自然史展示为主的米尔沃基公共博物馆(Milwaukee Public Museum)。位于芝加哥,由从百货业致富的菲尔德(Marshall Field)出资成立的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则于 1890 年成立③。另外,位于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辖下的美国国家博物馆虽成立于 1880 年,但其中的自然物标本直到 1910 年才被独立出来而成立专门的自然史博物馆。在美国的这波自然史博物馆发展运动中,由于是以大众教育(popular public education)为宗旨,因此展品以立体、拟真的动物标本(mounted taxidermy specimens)为主④。当时渐趋成熟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便是这类博物馆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博物馆策展人员更加注重能够让观众亲近自然的展示手法,除了许多早期发展的博物馆原本就有的同类单件标本系列陈列的方式之外,以四周透明玻璃的大展柜呈现生物群组标本(biological group)的展示方式逐渐出现,并蔚为主流。到了十九世纪末,制作成本更高、展示与观看效果更好的栖地透视展示装置开始逐渐地被许多博物馆采纳。

在这些自然史博物馆里,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可算是制作栖地展示装置最多的机构⑤。例如在 1898 年到 1920 年间,该馆就设置了 32 个以鸟类为主的大型栖地透视展示柜。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 1902 年推出的鹈鹕岛鸟群装置 (The Pelican Island diorama),呈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鹈鹕岛因栖地被破坏而导

①见安得思于1935年4月22日写给苏柯仁的信件。此信保存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之档案中。

②美国最早的博物馆出现于十八世纪末,但直到内战结束后,才开始有较多博物馆陆续成立。见 Steven Conn,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③即现在一般所知的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

Stephen Christopher Quinn, Windows on Nature: The Great Habitat Diorama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6, p. 10.

⑤有关这个博物馆的栖地展示装置,见 Stephen Christopher Quinn, Windows on Nature。

致某些鸟的种类面临灭绝的危机。据说由于此栖地透视装置逼真,感动了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任期 1901 年至 1909 年),使他在 1903 年立法,在鹈鹕岛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Wildlife Refuge)①。而这样的例子后来还发生过数次。可以说这样的展示装置大量出现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多少反映了当时兴起的生态保护观念。

由于许多动物标本剥制师本身也是常到野外捕猎的标本采集者,他们与以射猎为休闲活动的运动家多有往来,彼此成为互相支持的团体。后者经常自诩为运动家兼自然史学家(sportsman-naturalist),也标榜田野自然史学家(field naturalist)与书斋中或实验室中的自然史学家不同。在美国大西部开发之后,他们目睹一些野生动物或因为原有栖地遭到破坏,或因为遭到滥捕而数量大幅减少,因此成为生态保护的鼓吹者②。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经常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多次到美国西部进行探险和采集标本的旅行(collecting expeditions),并且将标本捐给各个自然史博物馆进行研究③。在他总统任期内,因为意识到野生环境因国家工业化、都市化等问题而遭到破坏,他因此积极推动保护野生环境的政策,任内共成立了5个国家公园、51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50个国家森林公园。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彻底反对捕猎,但是认为应该遵守运动家精神,而且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来加

①Karen Wonders, "Exhibiting Fauna: From Spectacle to Habitat Group", Curator, 32 (1989), pp. 131-156.

②Karen Wonders, Habitat Dioramas, pp. 157-158.

③此类由富裕人士组成的采集远征行动后又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地区。例如罗斯福提议让史密森学会出面组成一个非洲远征旅行团,采集的标本全归国家博物馆管理。他在 1909 年 卸任后实际进行了这样的非洲远征旅行。与他同行的有多位自然史博物馆界的标本收集人员,包括当时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首席剥制师艾克力(Carl Akeley, 1864—1926)。 艾克力后来转往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工作,并陆续有五次到非洲探险和采集标本的机会。虽然他在 1926 年死于刚果,但他为该馆规划的非洲哺乳类动物展厅于 1936 年正式开幕后,引领了美国大多数自然史博物馆设置非洲厅的风潮。见 Claudia Kamcke, Rainer Hutterer, "History of Diorama", in Sue Dale Tunnicliffe, Annette Scheersoi (ed.), Natural History Diorama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5, pp. 18-19。

以规范,俾使捕猎者的行为不违背大自然的生态等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自然史博物馆工作的标本采集者往往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双重的急迫性,不仅应该加速为濒临绝种的动物留下未来可供研究的标本,而且应该为尚未遭到改变的野生环境留下记录。栖地透视展示装置正好被认为可以响应这两个需求。除此之外,他们也认为博物馆有责任让更多群众认识大自然、爱护大自然。栖地透视展示装置正可透过视觉效果,让观者了解动物生前活动的环境,进而使他们景仰大自然,并兴起爱护之心。

苏柯仁虽人在上海,但与美国各自然史博物馆的人员多有往来^②。文会大楼于 1933 年重建后,博物院得以扩大面积,从原来的两间大房,变成占据新大楼第四、第五两层楼,而这两层楼被设计为镂空互通,这种规划多少是师法欧美一些自然史博物馆的设计。例如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内从 1909 年就开始规划,至 1936 年才正式开幕的非洲哺乳类动物展厅也是采取这样的设计。虽然亚洲文会博物院在空间及预算上远远不如同时代的美国大型博物馆,但其展柜设置的方式呼应了当时美国最主流的展示方式。此外,苏柯仁自诩为运动家兼自然史学家的心态也频频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文章和所参与的活动中^③(彩图七)。

在人口密集、快速都市化的上海,固定参与季节性射猎的运动家也一样观

①这样的论调在后世多少遭到不解与批评,见 Dana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Chapman & Hall, 1989。尤其是第三章。

②这点可从他为《中国杂志》撰写的科学动态类短讯中看出,另外在他与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人员的往来书信中亦可看出。他是许多英美探险家和自然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经过上海必见的人,亚洲文会博物院也是这些人一定会参观的地方,例如当时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职员就发表了参观的印象: Harold J. Coolidge, Jr., "Notes on a Visit to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in the Old World", *The Museum News*, 10 (1932), p. 6。

③例如他曾积极参与上海的保护鸟类运动,批评大量出口禽肉的外商公司。见张宁:《在华英人间的文化冲突:上海"运动家"对抗"鸟类屠害者",1890—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 年第 34 期。他在自己主编的 *The China Journal* 中有多篇短文反映出他对上海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等议题的关切,例如"Greater Shanghai as a Bird Sanctuary", *The China Journal*, XXIV, 3 (1936), pp. 116-117; "Game Sanctuaries and Their Importance", *The China Journal*, XXIV, 3 (1936), pp. 175-176。

察到都市扩张对动物自然栖地的破坏。苏柯仁似乎有意借由还原栖地生态的展示方式来让离大自然愈来愈远的城市居民亲近大自然,同时兴起保护自然的想法。不论他是否真的带动上海人保护自然的观念,但许多迹象显示,他在博物院的作为颇受当地民众肯定。一方面,参观过博物馆的民众会提到这些展柜带给他们的深刻印象;另一方面,苏柯仁所写的许多自然史领域的文章被选译成中文,刊载于大众科普期刊①。

根据一位带领学生参观该院的中学老师的说明,当时初中教育在一年级设有动物学一科,分上下两部分,上学期课程为脊椎动物,下学期为无脊椎动物,内容除简述各门代表动物之构造外,并稍及分类学。由于有些学校并无实物可供学生参考,该博物院便成为某些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校外教学的地方,而学生的反应颇佳②。参观人数的记录事实上也见证了这个博物院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在博物院尚未改建前,年度参观人数已达六千多人。博物院于1933年底重新开幕后,每月有上千人前往参观,到了1936年至1937年间,年度参观人数已逼近二万五千人,1939年的纪录是四万五千人,而1940年有六万五千人参观了这个博物院③。

六、结语

创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文会博物院在经历了初期的摸索、经营人力不稳定的情况后,逐渐确定其自然史博物馆的走向,而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受到上海当地社会重视,不仅有固定的洋人观众,华人参观人数也明显增长。

①在 1927 年到 1929 年间,《自然界》—刊就陆续刊登了十四篇翻译自其作品的文章。另外还有如伍况甫译:《香港生物志》,《学生杂志》1939 年第 3 期;朱锦成译:《科学史话:在中国的一个博物学的开拓者》,《新科学》1940 年第 4 期;宋洁如节译:《中国艺术中之动物图案》,《世界文化》1940 年第 6 期等。另外也有专册如伍况甫译,于 193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系列的《华北动植物一瞥》。《申报》也曾经刊登一位署名 EL 的记者对他的专访文章:《在博物学者的家中鉴赏了一个上午:访问苏阿德先生印象记》,《申报》1939年 5 月 16 日。

②高纯甫:《亚洲文会博物院脊椎动物标本纪略》、《华东联中期刊》1940年,第19页。

③参观人数的统计乃参考学会年度报告,其变化可见附表三。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重新整顿开幕后,其还原动物栖地的新颖展览方式,搭配科普演讲等活动,有效地吸引了许多学校师生,充分显现出博物馆不是一个置放死物、古物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用生动方式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地方。

另一方面,由于博物院注重大众教育的走向,需要专门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和标本管理者,无意中促成中国本地第一代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培育,将源于西欧的动物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并且在西人离去后,由唐旺旺一家族于中国当地科研机构继续传承相关技术,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技术流传①。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博物院内采用的动物栖地展示装置,也可看出这个博物院当时走在时代前端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展示方式来激起保护生态的概念,不仅与北美当时最新颖的展示方式同步,也见证了当时西人对于中国当地生态多样性与生态危机的观察。

亚洲文会博物院的历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在 1941 年年底遭到第一次中断^②。"二战"后文会虽勉强维持,但情况已大不如前。博物院在苏柯仁因病离华后,改由原本专管古物部门的裘毕胜(Harry E. Gibson)主持。1949 年政权转移后,文会改由中国人主持,勉强维持至 1952 年年中。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文化局资料,亚洲文会博物院的藏品在 1952 年 6 月由上海市文化局接管,内容有两部分:生物标本共 20 328 件,历史文物及艺术品共 6 663 件。当时还留用了博物院干部四人,皆为制作动物标本的技术人员。后来,这些标本连同震旦博物院的部分藏品,一并成为当地政府于 1956 年 11 月开始筹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基础藏品^③。这所位于上海延安东路 260 号的博物馆曾经被认为

①在中国的动物标本制作一行中,有"南唐北刘"一说,有关北方刘树芳一支的缘起和流传,可参考吴峥嵘:《标本名家刘树芳及传人》,《世纪》2009年第2期;吴峥嵘:《沧桑清黎阁:中国北派标本世家刘树芳家族百年兴衰录》,未刊稿。

②文会在 1941 年 10 月 16 日还办过一次公开演讲,见 The China Journal, XXXV, 1941, p. 201。

③上海市档案馆 B172—1—220—3"上海市文化局关于报送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所需材料的报告",日期为1956年3月13日。有关上海自然博物馆自1956年11月筹备以来至1990年代中期的概况,可参考中国博物馆学会编:《中国博物馆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页。

是"二战"后上海居民的共同记忆,但在 2014 年 5 月 12 日,因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即将开幕,此处馆址就此关闭^①。在此前曾参观过该博物馆的人应该还会看到许多"标本唐"家族成员的作品,以及部分继承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栖地展柜,感受到亚洲文会博物院的余韵。

①有关这个博物馆关闭前的最后场景,见袁菁:《博物:生与死的规模(上)》,《城市中国》 2016 年第 74 期。笔者于此要特别感谢徐家汇藏书楼徐锦华先生提醒我注意这篇文章,也感谢袁菁女士和吴峥嵘先生热心地提供我许多关于唐家晚近情况的资料。透过吴先生的费心安排,我有幸在 2016 年底与唐家后代唐子明、唐庆瑜、唐仕华先生见面,借其口述弥补了部分文献资料之不足,于此我要特别表达对三位唐老师的敬意与谢意。此外,胡芷嫣、林莉安、林韵丰三位助理协助搜集与整理资料,容我在此一并致谢。

附表一 亚洲文会博物院历任名誉院长一览表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业、身份	备 注
1874—1876	William Burgess Pryer (1843-1899)	英国领事 馆职员	
1876—1877	J. P. Martin (? -1877)	邮政局长	1877 年 7 月 7 日在任内去世,旋由 Fau- vel 代理
1877—1879	Albert Auguste Fauvel (1851–1909)	海关关员	法国人。1879年因调职而离开上海
1879—1883	De Witt Clinton Jansen (1840–1894)	礼查饭店 负责人	接替提前离职的 Fauvel,并继续担任一任;但因继任的 Kingsmill 因故无法履职,故再延续一年
(1881—1882)	Thomas William Kingsmill (1837–1910)	建筑师	英国人。在年会被选出,但因故无法履职,由 Jansen 续任
1883. 2— 1883. 11	H. L. Smith	医师	1883 年 2 月 27 日被推举,担任至该年 11 月,因离沪而提前离职,由新会员 J. W. Wilson 续任。
1883. 11— 1884. 2	J. W. Wilson	不详	接任提前离职的 J. W. Wilson, 仅任职 到 1884 年 2 月
1884—1886	Frederick William Styan (1838–1934)	安达生洋 行	1884 年 2 月开始担任该职
1886—1888	Herbert Elgar Hobson (1844–1922)	海关关员	英国人
1888—1891	Carl Alfred Bock (1849–1932)	外交官	瑞典人
1891—1894	De Witt Clinton Jansen (1840-1894)	礼查饭店 负责人	
1894—1896	Henry Vosy-Bourbon	良济药房	法国人
(1896—1897)	F. A. de St. Croix	保顺洋行	英国人。于 1896 年 6 月年会被推举,但后来婉拒担任该职,导致职务悬宕,至 1897 年 1 月 13 日才由新会员 A. Vosy-Bourbon 担任

续表

任职时间	姓 名	职业、身份	备 注
1897—1898	A. Vosy-Bourbon	良济药房	法国人。1898 年 3 月因离沪而提前离职,由 Robert H. Cox 续任
1898. 03. 23 —1898. 06	Robert H. Cox	不详	仅从 1898 年 3 月任至该年 6 月年度换任时,但后继无人担任,至 9 月 2 日才由 E. R. Lyman 担任
1898—1901	Edmund Rensselaer Lyman (? -1919)	上海格致 书院教授	在 1901 年 6 月任期结束前因离沪而提 前离职,由 Barchet 代理
1901—1902	Stephen P. Barchet	美国领事 馆医生	1901 年 6 月被推举,担任至 1902 年 6 月年度换任时
1902—1904	Kurt Schirmer	不详	被推举时为新会员,似未提供博物馆年 度报告
			1904—1905 年无博物馆年度报告,可能 无负责人
1905—1921	Arthur Stanley (1869–1931)	工部局卫 生处	英国人
1921—1927	Charles Noel Davis	工部局卫 生处	英国人。1923 年即由 Sowerby 担任共同名誉院长
1927—1946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中国科学 美术杂志 社社长	英国人。博物院在 1942—1945 年间因战争关闭
1947—1948	Harry E. Gibson	大来洋行	美国人

附表二 亚洲文会博物院系列讲座一览表

	日期	讲 题	主讲人
1	1935年3月6日	General View of the Museum 博物院简介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2	1935年3月13日	Mammals in the Museum 博物院中的哺乳动物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3	1935年3月20日	Chinese Coins 中国钱币	H. E. Gibson 古物部门负责人
4	1935年3月27日	Some Chinese Birds 一些中国鸟类	E. S. Wilkinson 禽类部门负责人
5	1935年4月3日	Fossils and What They Tell Us 化石及其讯息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6	1935年4月10日	Snakes and Lizards 蛇与蜥蜴	E. M. Buchanan 爬虫类部门负责人
7	1935年4月17日	Butterflies and Moths 蝴蝶与飞蛾	A. de C. Sowerby① 名誉院长
8	1935年4月24日	Chinese Fishes 中国鱼类	Yuanting T. Chu (朱元 鼎) 鱼类部门负责人
9	1936年2月26日	Peking Man, Our Oldest Ancestor in China 北京人:中国人最早的祖先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0	1936年3月4日	The Primates, or Great Apes, Monkeys and Lemurs 智人、猿人、猴子与狐猴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1	1936年3月11日	The Lager Mammals of China 中国的巨型哺乳动物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2	1936年3月18日	The Smaller Mammals of China 中国的小型哺乳动物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①此场演讲原本安排昆虫部门负责人 S. Josefsen-Bernier 主讲,此人因故无法出席,改由 A. de C. Sowerby 讲授。

续表

	日 期	讲 题	主讲人
13	1936年3月25日	The Birds of China 中国的鸟类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4	1936年4月1日	The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的爬行动物与两栖类动物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5	1936年4月8日	The Fishes of China 中国的鱼类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6	1936年4月15日	The Insects and Crustaceans of China 中国的昆虫与甲壳类动物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7	1936年4月22日	The Mollusks of China 中国的软件动物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8	1936年4月29日	Some Chinese Fossils 中国的化石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19	1936年5月6日	Chinese Archaeology 中国考古学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20	1936年5月13日	The Art of China 中国的艺术	A. de C. Sowerby 名誉院长

附表三 从学会年度报告看博物院之参观人数变化

相关年度	参观人数粗估和统计	资料出处(JNCBRAS)
1880	一年超过 300 人	1880 年第 15 卷,页 xxii
1885	从参观人数可看出民众的兴趣增加	1886 年第 20 卷,页 303
1887	参观者人数持续增加,超过前期	1888 年第 22 卷,页 297
1888	平均每个月有 300—400 人参观	1889 年第 23 卷,页 49
1888—1889	1888年6月1日—1889年4月30日,共3237人	1889 年第 23 卷,页 299
1890	一年约 3040 人	1890年第24卷,页327
1896—1897	华人参观者增多	1900年第31卷,页201
1900—1901	去年华人参观者特别多,尤其每天下午特别多	1901 年第 33 卷,页 83
1906	华人参观者颇多	1906 年第 37 卷,页 227
1907	每天有数百名华人参观者	1907 年第 38 卷,页 268
1912	博物馆在华人间受欢迎的程度可能会令人惊讶	1912 年第 43 卷,页 193
1916	参观者过多给博物馆带来困扰;尤其是华人参观者 太多,也许要考虑分疏,并且安排看守人	1916 年第 47 卷,页 xii
1916	限制华人参观者每周两个下午的参观时间	1916 年第 47 卷,页 xii
1917	限制华人参观者每周两个下午的参观时间	1917 年第 48 卷,页 xi
1923	欧美籍参观人数尚可,若有更多展品,应该会吸引 更多参观者	1923 年第 54 卷,页 ix
1927	华人参观者人数持续增加,可见博物馆响应了当地社会的期待	1927 年第 58 卷,页 vi
1928—1929	当年度 6665 人参观。实际统计数字: 1928 年 7 月份 480 人 1928 年 8 月份 506 人 1928 年 9 月份 582 人 1928 年 10 月份 496 人 1928 年 11 月份 450 人 1928 年 12 月份 398 人 1929 年 1 月份 465 人	1929 年第 60 卷,页 vi

续表

相关年度	参观人数粗估和统计	资料出处(JNCBRAS)
1928—1929	1929年2月份772人 1929年3月份684人 1929年4月份706人 1929年5月份693人 1929年6月19日止433人	
1929—1930	大众的兴趣持续不减,反应在实际统计数字上: 1929 年 7 月份 358 人 1929 年 8 月份 502 人 1929 年 9 月份 560 人 1929 年 10 月份 370 人 1929 年 11 月份 495 人 1929 年 12 月份 408 人 1930 年 1 月份 387 人 1930 年 2 月份 750 人 1930 年 3 月份 702 人 1930 年 4 月份 719 人 1930 年 5 月份 654 人	1930 年第 61 卷,页 iv
1934	平均每月有上千人参观	1934 年第 65 卷,页 xviii
1935	参观人潮稳定	1935 年第 66 卷,页 iii
1936	参观人数持续成长,尤其孩童数量增加	1936 年第 67 卷,页 iv
1936—1937	有详细记录,1936年7月是778人,到了1937年5月是3229人,其中在1937年2月达到高峰,有3389人参观;从年会报告的时间往回计算,不满一年的时间,已有24424人参观;其中有许多是小学生,但也有不少大专学生	1937 年第 68 卷,页 v
1937—1938	1937 年年中的战事对博物馆活动有影响,但从1938 年 1 月起,参观人数就持续增加,1938 年 11 月有 2623 人,12 月有 2171 人;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者,由于其资源受影响,因此到学会用图书馆、博物馆的人增多	1939 年第 69 卷,页 x

续表

相关年度	参观人数粗估和统计	资料出处(JNCBRAS)
1939	过去 12 个月内有 45 000 人参观,大约每月平均 3755 人,其中巅峰是 5 月,有 8254 人;全年比 1938 年多了约 21 000 人	1940 年第 70 卷,页 v
1940	一年至少有 65 049 人次参观,比 1939 年多 20 000 人	1941 年第 71 卷,页 xiii
1946	1946 年共 23687 人次参观,平均每天 85 人,平均每月 2220 人。实际统计数字: 1946 年 1 月份 2584 人 1946 年 2 月份 2329 人 1946 年 3 月份 2358 人 1946 年 4 月份 2334 人 1946 年 5 月份 2791 人 1946 年 6 月份 1859 人 1946 年 7 月份 2658 人 1946 年 8 月份 1835 人 1946 年 9 月份 1024 人 1946 年 10 月份 2309 人 1946 年 11 月份 2295 人 1946 年 12 月份 2311 人	1947 年第 72 卷,页 92
1947	这年大约有 43 517 参观人数,是前一年的一倍;其中四月、五月人数最多	1948 年第 73 卷,页 i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博物院谈话:中国元始祖先北京人》,《申报》1936年2月28日。

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

《晨光团参观博物院记》,《上海青年》1938年第38卷第23—24期。

- 陈胜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4年。
- 《创设博物院》,《申报》1875年11月4日。
- 戴丽娟:《从徐家汇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3 年第 2 期。
- 《在博物学者的家中鉴赏了一个上午:访问苏阿德先生印象记》,《申报》1939年5月16日。
- 高纯甫:《亚洲文会博物院脊椎动物标本纪略》,《华东联中期刊》,1940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职员录》,民国十八年(1929)。
- 亨利·尼克斯(Henry Nicholls),黄建强译:《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猫熊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2011年版。
- 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 1992 年版。
- 胡鸿兴:《唐家的鸟:记武汉大学生物系标本室高级工程师唐瑞昌》,《大自然》 1981 年第 2 期。
- 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江冬妮:《东方文化的使者:〈中国杂志〉简述》,《都会遗踪》2011 年第2期。
- 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李天纲:《导论》,上海图书馆编:《中国杂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 李祖凤:《标本世家的百年沧桑:六代人缔造的生物界传奇》,《知识家》2013年第1期。
- 《两颗头颅万里行》、《申报》1912年1月22日。
- 丘濂:《标本唐:一个家族的标本制作传奇》,《三联生活周刊》2010 年第 579 期。 宋洁如节译:《中国艺术中之动物图案》,《世界文化》1940 年第 6 期。
- 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4 年版。
-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上海市档案馆,B172—1—220—3,"上海市文化局关于报送全国博物馆工作会

议所需材料的报告",日期为1956年3月13日。

上海档案馆,震旦大学档案 Q244—470。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 2005 年版。

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六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伍况甫译:《华北动植物一瞥》,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伍况甫译:《香港生物志》,《学生杂志》1939年第3期。

吴峥嵘:《百年"标本唐"》,《档案春秋》2007年第2期。

吴峥嵘:《标本名家刘树芳及传人》、《世纪》2009年第2期。

吴峥嵘:《沧桑清黎阁:中国北派标本世家刘树芳家族百年兴衰录》,未刊稿。

《厦门大学七周纪念特刊》,厦门大学编译处周刊部。

尹文涓:《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2期。

袁菁:《博物:生与死的规模(上)》,《城市中国》2016年第74期。

袁菁:《标本唐:旨意与意志》,《城市中国》2016年第74期。

袁菁:《崇明东滩,"标本唐"的身影》,《城市中国》2016年第75期。

原壮、中旬:《本馆象标本制作的经过》,《西湖博物馆馆刊》1934年第2期。

曾昭燏:《博物馆》正中书局 1943 年版。

张宁:《在华英人间的文化冲突:上海"运动家"对抗"鸟类屠害者",1890—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34期。

赵锦福:《上海博物院参观记》、《科学趣味》1940年第3卷第2期。

中国博物馆协会编:《中国博物馆一览》,中国博物馆协会1936年版。

中国博物馆协会编: Guide to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

中国博物馆学会编:《中国博物馆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朱锦成译:《科学史话:在中国的一个博物学的开拓者》,《新科学》1940年第4期。

上海市地情资料库: 唐旺旺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429/node4432/node70711/node70715/node70723/userobject1ai54307.html(2010/1/24 浏览)。

二、西文文献

"A Shanghai Jubilee: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

- Oct. 1907.
- Box, Rev. E., "In Memoriam: Rev. Joseph Edki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 June 1905.
-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Inaugural Address", JNCBRAS, 1858.
- Clark, Robert Sterling,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rough Shê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T. F. Unwin, 1912.
- Conn, Steven,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Coolidge, Harold J., Jr., "Notes on a Visit to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in the Old World," *The Museum news*, 10 (1932).
- Davis, Charles Noel, "The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54 (1923).
- Dehergne, Joseph, «Le fonds Sowerby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3, 24 (1945).
- Fairbank, John et al.,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 Farber, Paul Lawr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axidermy and the History of Ornithology", *Isis*, 68 (1977).
- Farber, Paul Lawrence, Discovering Birds: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1760–185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urther Hunting of Giant Pandas Forbidden", The China Journal, XXX, 5 (1939).
- Haraway, Dana,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Chapman & Hall, 1989.
- Hornaday, William Temple,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Taxidermists", Science, vol.os-1, 4 (1880).
- "Interest Growing in Shanghai Museum: Novel Attraction in Display of 'Peiping Man' in Cave", North-China Herald, 27 Mar. 1935.
- JNCBRAS, ns., 1 (1864).
- Kamcke, Claudia, Rainer Hutterer, "History of Diorama", in Sue Dale Tunnicliffe, Annette Scheersoi (ed.), *Natural History Dioramas*, Dordrecht, Springer Ne-

- therlands, 2015.
- Kinnear, N. B., "Mr. C. B. Rickett", Nature, 3 June 1944.
- "Museum Lecture Series Completed", The China Journal, XXIV, 6 (1936).
- La Touche, John David Digues, "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JNCBRAS*, 40 (1909).
- La Touche, John David Digues,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 China,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vol. 2, 1931–1934, frontispiece.
- "Notes on Heude's Bears in the Sikawei Museum, and on the Bears of Palaearctic Eastern Asia", *Journal of Mammalogy*, 1, 5 (1920).
- "Obituary", JNCBRAS, 62 (1931).
- "Obituary: 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 "Ibis, 77, 4 (1935).
- Old Mortality (pseud.),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30 Oct. 1873.
- "On Heude's Collection of Pigs, Sika, Serows, and Gorals in the Sikawei Museum, Shanghai",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917.
- "Peking Man to Be Shown Here: Replica of Skull Donated to R. A. S. Museum", North-China Herald, 14 Nov. 1934.
- Pickstone, John V., "Museological Science? The Place of the Analytical/Comparative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History of Science*, 32 (1994).
- Pickstone, John V., Ways of Knowing: 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roceeding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NCBRAS), XXX, 1903-1904.
-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64 (1933).
- Quinn, Stephen Christopher, Windows on Nature: The Great Habitat Diorama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6.
- Rookmaaker, L. C., P. A. Morris, I. E. Glenn, P. J. Mundy, "The Ornithological Cabinet of Jean-Baptist Bécoeur and the Secret of the Arsenical Soap", *Archives*

- of Natural History, 33, 1 (2006).
- Rowley, John Stewart, Taxidermy and Museum Exhibition, 1925.
- "Royal Asiatic Society as Cultural For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30 June 1937.
- Smith, Carl T.,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tevens, Keith, "Naturalist, Author, Artist, Explorer and Editor and An Almost Forgotten President: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54 President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194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38 (1998).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Fur and Feather in North China,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14.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 London, A. Melrose, 1918.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Exploration of Manchuri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1.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22–1923.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56 (1925).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59 (1928).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3 (1932).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ang Wang Wang", The China Journal, XVI, 2(1932).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panda or cat-bears", *The China Journal*, XVII, 6 (1932).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Personnel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XIX, 5 (1933).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Journal*, XIX, 5 (1933).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Hunting the giant panda", The China Journal, XXI,

- 1 (1934).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6 (1935).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Greater Shanghai as a Bird Sanctuary", *The China Journal*, XXIV, 3 (1936).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Game Sanctuaries and Their Importance", *The China Journal*, XXIV, 3 (1936).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7 (1936).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hina's Natu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36.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A baby panda comes to town", *The China Journal*, XXV, 6 (1936).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8 (1937).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Live giant pandas leave Hongkong for London", *The China Journal*, XXIX, 6 (1938).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69 (1939).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eeti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25 Jan. 1939.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A Pioneer Naturalist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XXXI, 5 (1939).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70 (1940).
- Sowerby, Richard Raine, Sowerby of China: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1956.
- "R.A.S. as Cultural Centre in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24 July 1935.
- Roosevelt, Theodore, Kermit Roosevelt, *Trailing the Giant Pand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9.
- The China Journal, XXXV, 1941.
- "The Librar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 Apr. 1874.
- The North-China Herald, 25 Sept. 1858.
-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Museum Lecture Series Co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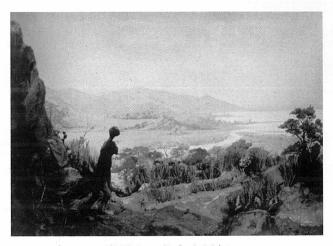
- ted", The China Journal, XXIV, 6 (1936).
- Vosy-Bourbon, Henry, "Honorary Curator's Report", JNCBRAS, ns., 27 (1895).
- Wonders, Karen, "Exhibiting Fauna: From Spectacle to Habitat Group", *Curator*, 32 (1989).
- Wonders, Karen, Habitat Dioramas: Illusion of Wilderness in Museums of Natural History, 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1993.
-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1st ed. 1867),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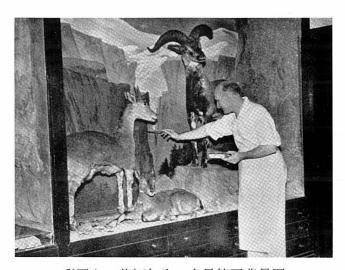
彩图四 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一景 (戴丽娟 提供)



彩图五 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中的猫熊标本 (戴丽娟 提供)



彩图六 北京人展柜 (戴丽娟 提供)



彩图七 苏柯仁为一个景箱画背景图 (戴丽娟 提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汉学.第十八辑,旧学新知:中欧知识与技术之演变/《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陆康,张柏春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9.1

ISBN 978-7-101-13632-6

I.法··· Ⅱ.①法···②陆···③张··· Ⅲ.①汉学-研究-法国-文集②科学史-研究-中国③科学史-研究-欧洲 Ⅳ.①K207.8-53②G332.9③G3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4229 号

书 名 旧学新知——中欧知识与技术之演变(法国汉学 第十八辑)

编 者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 康 张柏春

责任编辑 王贵彬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e.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¼ 插页 8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632-6

定 价 68.00 元